

青海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玛多湿地。（新华社图片）

“两山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

周方冶

作为 1992 年地球峰会“里约三公约”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是，从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却难以令人满意，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确立的“爱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如何通过“转型变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山论”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困境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界定，生物多样性是指来自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生态综合体的生物之间的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对于人类的生存与良好生活质量而言，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界提供了食物、能源、药品和遗传资源，以及对人类身体健康和文化遗产至关重要的各种材料。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曾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生物多样性获益良多。然而，随着工业文明来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升，逐

渐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土地和海洋利用改变、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等五个直接影响因素，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在广度、深度与烈度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评估，目前 75% 的陆地生态系统面临人类活动的影响甚至重压，森林覆盖面积尤其热带雨林面积持续减少，现有全球森林面积仅为工业革命前的 68%；内陆水域和淡水生态系统衰退严重，1700 年时存在的湿地到 2000 年时仅剩 13%，1970 年以来每年减少 0.8%；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

重影响, 33% 的鱼类种群被过度开发, 55% 以上的海洋面积受工业化捕捞影响, 珊瑚礁上活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 150 年里减少近半; 1970 年以来, 物种种群数量大幅下降, 陆地物种减少 40%, 淡水物种减少 84%, 海洋物种减少 35%。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人类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 尤其是 1972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环境规划署以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 并形成一系列双多边合作框架。其中, 1993 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具有关键性的里程碑意义。对此, 2018 年的联合国报告指出, “相较于早期的自然保护文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更加全面的方法, 查找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原因, 力求在所有相关政策领域中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因素。”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边合作框架确立,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迄今为止,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达 196 个, 成为全球参与度最高的联合国多边环境保护协定之一。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推动下,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较为积极的努力, 但实际效果难以令人满意。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2021年9月4日拍摄的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遭砍伐照片。(IC Photo图片)

计划》及“爱知目标”, 旨在为此后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战略框架和行动指南。然而, 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评估指出: 20 个“爱知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仅有 6 个部分实现; 60 个“爱知目标”具体要素仅有 7 个实现, 38 个有进展, 9 个无进展, 2 个进展情况不明, 4 个偏离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诉求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困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明确提出, “按照目前的轨迹,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无法实现, 2030 年及以后的目标只有通过涵盖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因素的‘转型变革’方能实现。”

所谓“转型变革”, 是指对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 包括范式、目标和价值观, 进行全系统根本性重组。目前, “转型变革”概念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并被写入《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 将成为下一个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 国际社会在如何理解和把握“转型变革”的具体问题上莫衷一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存在严重分歧。究其原因, 关键是在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上, 各方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禀赋分配在空间上并不均衡, 从而使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此, 2019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指出, “如果优先考虑自然对人类的某一种贡献, 例如粮

食生产，可能导致生态变化，从而使其他贡献减少。其中一些变化可能会使某些人受益，而其他人，特别是最脆弱者要承受代价，技术和体制安排方面的改变也是如此。”

针对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国际社会迄今未有共识方案。国际社会通常在表态时采取“权衡取舍”的中性立场，但在落实过程中，由于国际话语体系长期受西方影响，很容易导致“权衡取舍”结果不利于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权益为代价，满足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诉求。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19年《全球环境展望（第六版）：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报告中对当前不合理不公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体系表达了深刻担忧。

“两山论”为“转型变革”贡献中国经验

相较于全球困境，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显著的是植树造林。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2000—2017年，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全球新增绿地面积中有25%以上来自中国。此外，从“爱知目标”来看，中国除了尚未以国家专门立法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目标16）以及沿海与海洋保护面积未达10%（目标11）之外，其他目标均已实现或基



2021年10月31日，在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拍摄到白鹭嬉戏。（IC Photo图片）

本实现，成为全球落实“爱知目标”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如此成就，最为重要的就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论”）的广泛社会共识，从而解决了保护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率先迈出了国际社会所期盼的“转型变革”关键步伐。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关系的“三阶段论”，不难发现当前国际社会正在“两山论”第二阶段迈入第三阶段的门槛前徘徊。

具体而言，“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这是各国起步阶段的普遍做法，片面强调发展

优先，对环境承载力不考虑或者鲜有考虑。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环保意识增强，国际社会目前已基本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相关做法，从而整体上跨越了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是各国在工业化起步后面临的发展困境，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之间矛盾显现，人们逐渐有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辩证思维。不过，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很难独自承担起兼顾“绿水青山”的发展成本。据统计，2008年到2019年，中国为保护全国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累计拨付资金 5235 亿元。如果以此为参照,未来十年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年均资金缺口将高达 7000 亿美元。

“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通过“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就是”二字,“两山论”在第三阶段从辩证统一的哲学高度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第二阶段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不复存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辅相成,形成“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

例如,地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通过采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协调的

解决方案,近年来成功脱贫,摘掉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并于 2019 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 个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不过,“两山论”第三阶段是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大跨越,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与人才储备,而且需要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结构性的产业升级。中国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特别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依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初步实现了发展阶段的跨越式迈进。

反观当前国际社会,有能力有条件推动文明跨越的发达国家不仅无意放弃在工业文明阶段积累的优势地位,而且试图继续坐享不平衡不公正的全球产业格局伴生的“超额红利”,始终不愿踏出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的关键步伐。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无资金亦无技术与人才储备,更无消费市场支撑,根本无力推动文明跨越,唯有被动承受“权衡取舍”的不利后果。

以“两山论”重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话语体系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处于艰难调适关口,能否有效推进“转型变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达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事关人类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作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需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随着国际社会对“转型变革”认同的日益加深,长期以来西方把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主导权开始动摇,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传统上过度强调保护与发展“权衡取舍”、漠视甚至压制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发展诉求的国际话语体系提出质疑,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为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提出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进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不过,随着当前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双方曾经关系较为融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很有可能从“合作”转向“竞合”甚至“竞争”,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也可能被“政治化”,成为美国新的“对华遏制”牌。

鉴此,如何以“两山论”为依托,把握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变革”的历史契机,重塑国际话语体系,改变传统上局限于西方工业文明立场的话语表达,构建更开放、更包容、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生态文明话语逻辑,也就成为确保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关键所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而道远,再加上国际话语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任何改变都很难一蹴而就。因此,

这是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新闻中心拍摄的大幅彩绘。(新华社图片)

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要坚持循序渐进,要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引导工作,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以“知行合一”建构“两山论”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话语引领地位。

第一,加强多渠道对话,促进理念转变。国际多边合作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合作的重要高地,特别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权威性与引领性。中国作为东道国,抓住《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契机,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国际宣传有重要价值,将有助于面向全球更好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然而,国际多边合作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而且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机制约束,要在既有合作框架下推动模式创新相当困难,非短期努力就能见效。事实上,从以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来看,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东道国都曾积极努力,试图在既

有合作框架下印刻体现本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但从成效来看,更多仅取得短期形象效应,难以形成长期重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转型变革”,使“两山论”成为引领新时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权威话语,有必要加强多渠道对话。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要通过智库媒体等,以生动形象的“中国故事”讲实讲深讲透“两山论”,并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与国际受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众一道探索“两山论”在对象国的实践应用,扎实推进“两山论”在全球的本土化进程。

第二,深化南南合作,推进制度创新。相较于国际秩序既得利益方的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保护与发展”结构性矛盾,也更可能理解和接受“两山论”。但在当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全球产业格局约束下,发展中国家缺乏自主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的必要条件,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社会“权衡取舍”不利结果。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近年来,中国在绿色经济、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提高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能力的项目和活动,至少有80多个国家从中受益。习近平主席更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表示,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同时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有序提供资金、技术与人才储备支持,并在此基础上“以南促北”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创新,以“两山论”的中国实践为蓝图,发展和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等多边制度框架,既有助于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变革”观念共识及时有序转化为具体行动,也有助于防范相关观念共识在西方影响下出现倒退甚至逆转。

第三,拓展次区域合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尽管中国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要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仍面临西方主导下的既有国际话语压力。为此，通过深化次区域合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功样板，既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信心，“知行合一”发挥“两山论”在对象国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引领作用，也有助于“让事实说话”，遏止西方否定中国经验的不实言论。

其中，“绿色澜湄”合作颇具代表性。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简称澜湄流域）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拥有不少于2万种植物、1200种鸟类、800种爬行和两栖动物、430种哺乳动物，并持续有新物种被发现。同时，澜湄流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渔业，占到全球淡水捕捞量的25%，为至少6000万人提供生计。不过，澜湄流域正处于经济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时期，环境和生态系统面临沉重压力，尤其是森林覆盖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从55%降至34%，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近年来，中国在澜湄合作框架下与老挝、缅甸



2021年10月2日，昆明市在重要片区、道路设置立体花坛，喜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新华社图片）

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17年成立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到2019年各国批准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澜湄次区域合作重要内容。

从中长期来看，进一步探索和推广“绿色澜湄”合作成功经验，

以现有的中俄、中蒙、中日韩、中非等双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有序拓展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合作，将有助于夯实共识基础，进而由点及面、自下而上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